

日本的毛泽东研究论析

曹景文

(华东师范大学 社会科学部,上海 200062)

摘要: 毛泽东研究是世界范围内的重要课题。日本的毛泽东研究在国外毛泽东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日本毛泽东研究的形成和发展历程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对于考察国外毛泽东学学术史有着重要意义。日本学者在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和哲学思想、毛泽东与中国模式的关系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日本学者的毛泽东研究对于我们深化国内的毛泽东研究有多个方面的启示和借鉴。

关键词: 毛泽东; 日本; 中国研究

中图分类号: A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16)06-0044-08

A Discussion and Analysis of Japanese Studies of MAO Zedong

CAO Jingwen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 The study on MAO Zedong is an important topic in the world. The Japanese study of MAO Zedong occupies an important position overseas. Japanese study of MAO Zedong has its own features in its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Japanese scholars research into the historical position of MAO Zedong, his military and strategic thinking and his philosophic think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O Zedong and Chinese model. Japanese scholars' study of MAO Zedong has many aspects of enlightenment and reference for us to deepen the study of MAO Zedong.

Key words: MAO Zedong; Japan; Chinese study

毛泽东是历史伟人。习近平指出“毛泽东同志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他不仅赢得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爱戴和敬仰,而且赢得了世界上一切向往进步的人们敬佩。”^[1]毛泽东研究是海外中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研究已成为海外学界的“显学”,而日本则是海外毛泽东研究的中心之一。加强对日本学者的毛泽东研究的探讨,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海外毛泽东研究的认识,进而推动国内毛泽东研究的深入开展。

一、日本毛泽东研究的历史考察

与其他国家的毛泽东研究相比,日本的毛泽东研究可谓起步早、起点高、成果多、规模大、领域广、特点鲜明。从整体上来说,日本的毛泽东研究可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

收稿日期:2015-10-0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国外中国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研究综述”(编号:11BSK053)

作者简介:曹景文(1965-),男,山东嘉祥人,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社科部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海外中国学。

1. 初创阶段(1927——1945年)

日本人开始知道毛泽东的名字要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据野村浩一在《毛泽东:人类智慧的遗产》一书的序言中讲,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日本人就已经知道了毛泽东是“朱毛军”的首领。这与大多数普通中国人知道毛泽东的名字应该是在同一时期。当时,日本人撰写的《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新关系》《中国共产党文献考》等20多篇文章中,都或多或少地提到了毛泽东的名字,有的还颇费笔墨地对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和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等事迹进行了评述。

日本人更多地了解毛泽东和他领导的中国革命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进行了长达14年的艰苦抗战。这对于在华作战的很多日本人来说,当年共产党游击队的首领毛泽东,现在已经成为指挥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军队开展对日作战的中共最高领导人了。日本人在此期间发表了上百种有关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文章和书籍,这些成果除少数日本革命者所撰写外,多数是为日本侵华服务的文人的作品。因此,搜集有关毛泽东和中国革命的情报是这一时期日本毛泽东研究的主要特点。如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出版的《支那共产党之概况》、华北派遣军宪兵队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等书籍。

1938年,日本政府成立了“东亚研究所”,对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人文和自然状况进行调查,第一步就是专门开展中国问题的调查。他们曾翻译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由于受意识形态观念的影响,有些日本人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极尽污蔑之能事。朝日新闻的记者波多野乾一曾在日本《大安》杂志上发表《延安水浒传》一文,他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挑选了108人,冠以《水浒传》里的绰号,一一进行评述。其评论多是不实之词,甚至是极端恶毒的攻击。在文章的结尾,他还恶狠狠地说“这一辈家伙都是罪该万死的恶魔,我们要赶快加以扑灭。”^{[2] (p252)}

在中国的一些日本革命者多能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来评述毛泽东和中国革命。这些人主要是在延安的日共党员冈野进等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日人反战同盟成员。他们参加了中国的抗日战争,亲眼目睹了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的革命活动,对中国革命和毛泽东思想有一定的了解,他们的评述较为符合客观和实际情况。

由于这一时期日本的毛泽东研究多以搜集情报和新闻报道为主,还谈不上学术意义上的毛泽东研究,但为后来日本和海外的毛泽东研究奠定了坚实的资料基础。

2. 初步发展阶段(1946——1965年)

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彻底改变了中日关系,极大地促进了日本的毛泽东研究进入学术殿堂。曾参加中国抗战的一些日共党员回国后,积极地把毛泽东思想介绍给日本民众。尾崎庄太郎翻译的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中国共产党三十年》,鹿地亘翻译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章,在日本社会广受欢迎。一些介绍和评析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的书籍开始出版,如岩村三千夫的《毛泽东的思想》一书,高度评价了毛泽东的国际意义,他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亚洲版的代表。美国记者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于1952年在日本翻译出版。这都使毛泽东在众多的日本人,特别是青年学生中形成了高大伟岸的形象。

战后日本的众多学术团体积极开展毛泽东研究。1946年1月,岩村三千夫、野原四郎等人筹备成立了民间研究机构——中国研究所,专门从事当代中国问题研究,主办有《中国研究所报》。1951年,以中国研究所为母体,成立了现代中国学会,《中国研究所报》更名为《现代中国学报》,并创办了《现代中国》杂志。中国研究所和现代中国学会在日本战后初期的毛泽东研究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大塚有章在1962年成立了日中友好学院,组织进步工人和青年学生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这也是一所从事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民间机构。

这一时期,日本学者十分注重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竹内好认为,毛泽东的根据地理论是一种哲学概念,充满了必胜的信念。1952年,松村一人在《思想》杂志上以《论毛泽东之哲学的意义》为题连续发表文章,对《矛盾论》和《实践论》等毛泽东的著作作了深入分析,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历史地位和重要意义。次年,他还出版了《辩证法的发展》一书,进一步系统地论述了毛泽东的哲学思想。

1958年,新岛淳良也在《思想》杂志上发表文章,认为毛泽东是实践辩证法的发现者。

3. 高潮阶段(1966—1978年)

中国“文革”对日本的毛泽东研究影响很大。在日本青年学生中出现了“新左翼运动”的勃兴,特别是“三M”主义(即马克思、毛泽东和马尔塞库的思想)在日本的青年学生中有着很大的影响。当时,几乎所有的日本高校都出现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组织,讨论气氛十分热烈。这一背景促成了日本毛泽东研究进入高潮阶段。

特别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毛泽东研究更是引起了日本学界的高度重视。由于受“文革”时期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影响,日本学界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论异常热烈,形成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围绕着对“文革”的评价,在日本形成了“亲华”和“反华”两大学术流派。由于受当时中国“文革”形势的影响,在“亲华”派中出现了从神化毛泽东到赞美林彪,甚至追随“四人帮”主张的情况。他们认为,中国的“文革”创造新型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运动,是给世界史增添了新的一页的“触及灵魂的大革命”,将其看作是“世纪性实验”。“反华”派学者则认为,中国的“文革”是单纯的“权力斗争”,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文化革命。^{[3][p298]}

1967年,大塚有章领导的日中友好学会改组成了“日本毛泽东思想学院”。这是世界上唯一一所研究和宣传毛泽东思想为主的学校。大塚有章、井上清、中岛健藏等著名中国学家积极参与学院的教学和研究活动,定期举行毛泽东思想学习会。进入20世纪70年代,参加学院学习活动的成员开始由左翼青年学生为主转为以工人为主。

这一时期,日本出版了大量的有关毛泽东和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如日本国际所编辑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史资料集》、竹内实编辑的《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的语录》和《毛泽东集》、东京大学近代中国史研究会编译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新岛淳良编辑的《毛泽东最高指示》、矢吹晋编辑的《毛泽东谈社会主义建设》等都是十分珍贵的文献资料。这些出版物为日本学者的毛泽东研究提供了基础资料。

4. 深入发展阶段(1978年至今)

毛泽东去世后,由于受中国改革开放形势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发表的影响,日本的毛泽东研究出现了降温的现象。但随着中国实行开放和公布了大量有关毛泽东的档案材料,这一时期的毛泽东研究呈现逐步深入的趋势。

日本学者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无论是“亲华”的学者还是“反华”的学者,都纷纷反思自己在“文革”时期的毛泽东研究,不断根据新的资料调整自己的观点。很多学者把毛泽东研究的焦点,开始聚焦在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探讨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上。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很多日本学者把毛泽东研究放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社会主义建设的宏观历史上进行深入的研究。2009年,现代中国学会出版了《新中国的60年——从毛泽东到胡锦涛的连续与不连续》一书,收入近藤邦康、奥村哲、砂山幸雄等人的文章,探讨了毛泽东与新中国50年的关系。

这一时期,日本学者又编辑出版了有关毛泽东研究的新的文献资料,如太田胜洪、小岛晋治、高桥满、毛里和子合编的《中国共产党最新资料集》、竹内实主编了《毛泽东集补卷》等。有些学者还多次到中国进行实地调查和搜集第一手资料。

由于受中国国内“非毛化”思潮的影响,有些日本学者曾试图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井上清等人对此坚决反对,他们认为:不管怎么说,是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实际中去,并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具体地分析了中国的具体现实,找到了中国革命的道路,最后制定出农村包围城市这一马克思和列宁都未曾考虑到的,当时被共产国际视为异端的伟大战略,而且在革命实践中取得了胜利。我们就是要学习这种思想和方法。他们指出: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等哲学著作的理论价值,今天依然非常有效和有益,是不可缺少的理论指针。

二、日本毛泽东研究的主要内容

日本学者的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研究涉及的范围很广,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多个领域,但

有深度的研究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多数日本学者认为,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充分肯定毛泽东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做出的卓越贡献。他们普遍认为,毛泽东是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毛泽东虽然并非代表中国的全部,但在考虑当今中国时,无视毛泽东的贡献是完全不行的。

(1) 毛泽东是20世纪的历史伟人。毛泽东的生平研究是日本学者研究的重中之重,这是因为很多人敬佩毛泽东的人生并不平坦,甚至可以说是在没有路的地方走过来的。松本一男曾用“汗牛充栋”来形容日本的毛泽东传记之多。他描写了当毛泽东去世的消息通过收音机播送后的人们的心情“过去半个世纪身为中国革命之代名词,建国以后执国际外交之牛耳的这位巨人,他的死犹如晴天霹雳,给中国人带来极度地震撼,有人泪流满面,而有人则在心中默默饮泣。”^{[4] (p1)} 松本一男甚至认为,毛泽东建立新中国的功劳,与秦始皇、成吉思汗、亚历山大等古今中外的英雄豪杰比起来,可以说是最大的。野村浩一在《毛泽东:人类智慧的遗产》一书中指出:毛泽东是伟大的革命家,是率领几亿中国人民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动乱中创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革命运动的领袖;毛泽东大大改变了亚洲的地图,重写了历经一个世纪的中国半殖民地的历史。毛泽东不仅是一位20世纪的中国人民的伟大解放者,而且也是一位给当今世界以巨大影响的杰出人物,这是不容否定的。竹内实认为,“毛泽东是一位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文学家和教育等方面的巨人。要理解他,当然要综合性地深入思考这些方面。”^{[5] (p37)} 特别是战后的世界中,中国的独立和发展显然具有巨大的意义,这是通过毛泽东的存在而完成的。竹内实还认为,“毛泽东是一位以中华世界为对象奋斗一生的人物。把他放到中国悠久历史的长河中研究,他应该在中华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毛泽东把一个国家放到历史的舞台上了。抹杀毛泽东的名字,也就没有了中国革命的历史。”^{[6] (p20)} 确实,毛泽东的去世,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但毛泽东作为历史伟人,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2) 毛泽东思想是人类智慧的遗产。新岛淳良称毛泽东为现代首屈一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柳田谦十郎认为,毛泽东的所有著作都是根据中国的历史、中国的风土和中国的现实,而且多数都是为了直接指导当时的革命实践而写的。毛泽东的著作对于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来说,起到了既十分适用又极为有效的行动方针的作用。野村浩一指出:毛泽东思想是确凿无疑地代表或象征着20世纪当代世界的一份智慧的遗产;毛泽东思想在今天的中国仍然是亿万人民行动的指南。新岛淳良还论述了毛泽东思想对国际社会的影响,他说“毛泽东思想在广大的第三世界与马克思主义之间架起了桥梁。而且,毛泽东是站在第三世界——占人口绝对优势的是农民——的前头,为人类开辟走向幸福天堂的道路。”^{[7] (p142)} 竹内实在评论中苏论战时指出:在同苏联展开论战时,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继承者而出现。也就是说,即使在具有人类普遍真理的世界上,毛泽东的地位也是最高的。

(3) 毛泽东晚年犯有错误。毛泽东晚年的思想是日本学者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多数日本学者认为,毛泽东“文革”时期的思想与其前期的思想有很大的差别,应将其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经受了考验的毛泽东思想,另一部分是其晚年的思想。中西功就认为,这两部分思想,无论在政治内容上,还是在对事物的看法以及对世界的分析上,都非常不同。毛泽东晚年忽视了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现实,而仍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老办法来解决新问题,才导致了毛泽东晚年思想上的错误。中西功等人的这一观点在日本学者中很有代表性。

2. 毛泽东的哲学思想

由于中日文化密切的关系,日本学者十分注重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重点探讨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

(1) 毛泽东哲学思想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之间的关系。野村浩一认为,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一灵魂的体现,推动了中国的解放事业,因而能与列宁主义相提并论。在野村浩一看来,毛泽东是从中国的传统哲学出发,接近进而接受马克思主义,同时对中国

传统的“知行观”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都作了一些补充。大滨浩、加地伸行等人探讨了毛泽东的辩证法与中国传统辩证法的关系,认为毛泽东辩证法的许多思想观点来自于对传统辩证法的继承。但新岛淳良等人则认为,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在本质上与阴阳二元论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国传统阴阳二元论是毛泽东辩证法的“反面教员”。

(2) 毛泽东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关系。竹内实、尾崎庄太郎等人认为,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等哲学著作,与其说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之上而成的著作,莫不如把它说成是基本上通过从日本翻译的苏联教科书的学习而成的。他们认为毛泽东的哲学著作是以米丁等人为中心编写的教程、辞典等为基础,而且不少部分是完全借用的。但在谈到“知”和“行”的问题时,新岛淳良认为,毛泽东是用“知和行的关系”就是说用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来论述的。毛泽东把实践看作是一切的“行”,实践首先是作为一切认识(知)的源泉,同时又作为理论的(被系统化了的知)检验标准。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只提到实践单纯处于理论的检验阶段,特别是斯大林把实践的含义缩小到党的“方针”的“实行”上。新岛淳良认为毛泽东在这方面超越了他的前辈。柳田谦十郎肯定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的贡献。他说:毛泽东“把矛盾分成‘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可以说以前的唯物论者不大注意这一点。那不单纯是新的构想,而是起到了为当时中国的革命实践制定极为重要又十分适当的行动方针的理论基础作用”。^{[8] (p111)}他还认为,毛泽东的《矛盾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不仅在于给辩证唯物论的发展历史增添了新的内容,而且还在于它明确地提出了中国人民斗争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为什么要由过去国内的阶级斗争转变为与国外的日本帝国主义展开民族斗争的理论根据。

(3) 自觉能动性理论是毛泽东认识辩证法的最重要理论之一。竹内实认为,毛泽东思想的中心内容就是“自觉能动性”,其自觉能动性思想萌芽于1917年的《体育之研究》一文。随着毛泽东认识论的成熟,毛泽东在《论持久战》等文章中,自觉的、能动性的辩证过程思想得到了系统阐发。到1958年“大跃进”时,毛泽东也大力宣传“主观能动性”,但结果不尽人意。竹内实解释了什么是自觉的能动性,所谓“自觉的能动性”、“主观能动性”,简单地说,就是“干劲”。作为唯物论者的他,清楚地知道,围绕着人的事和物是有规律的,那种规律是不能靠人的力量随意改变的。尽管如此,他说首先作为一个人,是否有“干劲”是带有决定的。可以说,竹内实抓住了毛泽东思想中的这一重要特征。其实,在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中国,没有“干劲”是不可能成就任何事业的,发动组织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没有错的,关键是如何处理好自觉能动性与客观规律的关系。

3. 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

多数日本学者认为,毛泽东在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时期发挥了卓越的军事才干,是军事天才,在军事战略思想方面做出了独创性的贡献。

(1) 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的来源。日本学者认为,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内容,但其军事思想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吸收了西方军事理论著作的精华,特别是吸收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的合理部分,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战争观。久住忠男指出:毛泽东确实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把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中的各种战斗关系作了清晰的说明。二是受到了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战略战术思想影响,特别是毛泽东从青少年时期就十分喜爱的中国传奇小说的影响,以及《孙子兵法》等中国古代兵书思想的影响。中岛岭雄指出“使少年时期的毛泽东心醉的英雄豪杰的不屈不挠的形象,不仅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整个过程中抱有‘正义必胜’信念的鲜明映像,而且这些英雄豪杰的权术,正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理论的重要源泉。”^{[9] (p12)}他还认为,毛泽东将这些英雄豪杰使用权术的各种形态分为“正义和非正义”,并以此为主要媒介形成了其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理论。

(2) 毛泽东的战略战术。久住忠男十分推崇毛泽东的游击战理论,他认为在20世纪产生的最优秀的战略理论中,首推毛泽东的游击战理论。伊藤皓文认为,毛泽东的战略理论是从敌大我小这一力量关系为出发点而提出的。他认为,毛泽东的战略是弱者的战略,是弱者转化为强者的战略。河野牧认为,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斗争时期形成的军事原则至今都是中国战略思想的基础。持田真一认为,毛泽东的

战略理论有五个方面:统一战线战略、根据地战略、持久战战略、游击战战略和核战略。这些战略又有四大特色:军事战略从属于政治策略、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原则、诱敌深入的思想、打歼灭战的思想。松本一男指出 特别是毛泽东的游击战术的基本思想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成为世界各地实行革命战争的模式。

(3) 毛泽东的军队建设理论。日本学者认为,毛泽东的军队建设思想包括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民主、三大任务、三大关系(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等方面的内容。竹内实认为,毛泽东不仅规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更为重要的是建立起了检查执行情况的制度。他说“在驻扎有红军的村落,当红军一出发,后面便留下检查班,一户一户地访问村里的每一家,向村子里的人打听借的东西还了没有?损坏的东西赔偿了没有?买东西付钱了没有?由于检查形成了制度,红军士兵不容分说都掌握了这些规定。”^{[5](p117)}所以,毛泽东作为领导人的才能,并非仅表现在公布这些规定上,应该说表现在严格执行检查上。后来,毛泽东还总结出管理教育军队的一些方法:要深入群众,大众化;要经常关心、照顾士兵;要以身作则;做到让士兵自己教育自己,走群众路线;说服教育比惩罚更重要;宣传鼓动比命令更重要,反对命令主义等。松本一男在分析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军队赢得胜利的原因时指出“毛泽东觉得,为了在战争中获得胜利,光是采用正确的战略还不够,按照从井冈山时代起的传统,政治上的说服和抓住群众的心才是取得胜利不可欠缺的条件。因此,毛泽东决定实施收揽人心的政策,譬如土地改革、统一战线、重新认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唤起国内外的舆论等。”^{[2](p201)}

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发展模式

对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关系的探讨,是日本学者长期关注的热点问题。很多学者认为,毛泽东对中国模式起了奠基和开拓的作用。

(1) 毛泽东对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起了开拓作用。日本学者普遍认为,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开始探寻中国发展道路的重要标志。如竹内实就指出,毛泽东在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一文提出了国家经营管理方面的构想。在竹内实看来,毛泽东的这篇文章对当时视为绝对的苏联模式——重工业优先政策提出了异议,开始寻找一条适合中国的道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新岛淳良有不同的观点,他说“大约在1957年以前,中国的领导人是从苏联那里寻求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然而,在实践过程中发现,只靠这些还有许多问题解决不了。”他认为,毛泽东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出的“通过农业建设和其他方面的建设,为地方经济的多样性和机械化服务”等观点,“已明确地意识到不可照搬苏联的经验,中国应该走自己的路”。因此,《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探索中国发展模式的标志性文献。^{[7](p124)}中西功则认为,在1956、1957年,毛泽东在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等各方面都在摸索着“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所有这些经验都在“八大”上做了总结,而且作为中共的“社会主义道路”确定下来。

(2) 客观看待毛泽东时期的中国模式。石川滋对1958年“大跃进”时期中国发表的统计数字表示怀疑,但也不同意美国学者关于中国经济崩溃的观点。他在20世纪60年代先后发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与探索》、《中国经济的长期展望》等文章,批驳了中国经济崩溃的观点,认为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中最为扎实,社会主义对于中国摆脱落后有重要意义。西嶋定生1966年出版了《中国经济史研究》一书,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日本学界长期存在的中国社会陷入“停滞”的说法进行了质疑,但也认为“大跃进”等中国发生的事物以及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所坚持的意识形态,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本来思想。一些学者在看到“大跃进”和“文革”给中国带来破坏的同时,也认识到毛泽东时期有许多好的做法和成功的探索,特别是对毛泽东时代出现的干部、工人、技术员的“三结合”以及现代工业和地方小企业、现代技术与传统技术同时得到重视的“两条腿走路”方针,给予了高度评价。

三、日本学者毛泽东研究的特点

日本学者的研究视角、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都有不同于国内学者之处,逐渐形成了鲜明的特点。尽

管他们所得出的观点不一定完全客观公正,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其研究对推进国内的毛泽东研究还是有多个方面的启示和借鉴作用的。

1. 进行史料的搜集、鉴别和整理,运用最早的版本考察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竹内实的《毛泽东集》及其补卷是日本学者在毛泽东著作编辑文本考订方面的代表性成果,受到国际学界的高度肯定。后来的日本学者开展毛泽东研究多承袭了这一学风。近年来,一些学者搜集、鉴别了一批未曾公开发表的毛泽东的文章。村田中禧于2010年在西藏博物馆发现了一封毛泽东在上世纪50年代写给达赖的信,多方考证后,他建议进一步公开史料。2004年6月的《文艺春秋》杂志公开了加藤哲郎发现的毛泽东写给日共原领导人冈野进的两封亲笔信,预测了抗战结束后的中美、中日关系。新岛淳良在研究毛泽东早期思想时就发现,《毛泽东选集》中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与原著作并不一样,因此主张要根据原文开展毛泽东思想研究。同时,他们又认为文章修改也有研究的必要,说明了当时的历史形势的发展变化。1950年12月,《实践论》在《人民日报》发表后,一些日本学者将其与20世纪30年代的原著比较,也发现了许多不同之处。如原文中在论及实践时,仅限于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后来根据中国的实际需要又加上了科学实验。进行这样的修改,是因为中国正需要专家,包括大量的理论家,尤其是自然科学工作者的支援。

美国学者施拉姆对竹内实编辑的《毛泽东集》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一部仔细而有批判地编辑而成的毛著作集。这部著作不仅可以使人们方便地得到大量迄今只能在分散的,有时是字迹模糊的原始材料中获得的東西,而且指出了1951年的官方版本中所有经过改动的地方。”“这个东京版本对于每一个对20世纪前半期中国历史和政治作严肃的学术研究的人来说,都成了不可缺少的参考工具。”^{[10] [p215]}

日本学者主张客观公正地评价毛泽东,对于那些贬低毛泽东的书籍则持谨慎的态度。宇野重昭对张国焘的《我的回忆》、苏联国际工人运动所编的《共产国际与东方》等书籍进行了质疑,他提醒从事毛泽东研究的学者“在利用这些有反对中国共产党性质的资料、回忆录、史论时,应看准其特定的意图,小心谨慎地使用。”^{[13] [p309]}

2. 注重借鉴其他国家的成果,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推进毛泽东研究深入开展

日本学者十分注重翻译其他国家学者的毛泽东研究成果。如美国学者施瓦茨的《中国共产主义和毛的崛起》、美国学者麦克法夸尔、沈迈克合著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英国学者菲利普·肖特的《毛泽东传》等书籍,颇受日本学界的关注。

为影响日本的中国研究,美国的一些基金会还对日本学者提供资助。如1962年,美国的亚洲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就向日本的东洋文库提供了17.3万美元的资金,用于日本学者对中国问题的研究。这引起了日本学者的激烈争论。赞同接受资助的学者认为可以推动日本的中国研究。但反对的学者认为这是美国人别有用心,要控制日本的中国问题研究。不可否认的是,美国基金会的资助加强了日本学者的国际交流活动,推动了毛泽东研究的深入开展。

日本的毛泽东研究受美国和国际政治风云的变化影响很大。围绕对新中国和毛泽东的评价,出现了“亲华”和“反华”两大派别。两派都不能客观公正地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在“文革”时期,“亲华”的学者对毛泽东的思想全盘肯定,甚至对“文革”表示理解和支持;而“反华”的学者则对毛泽东的思想全盘否定,认为中国的“文革”过于强调了阶级斗争,是权力斗争。

中国改革开放后,一些日本学者获得了长期在中国工作或学习的机会,不仅改善了他们研究毛泽东的条件,而且促进了与中国学者的交流。中国学者的一些研究成果也逐渐得到了日本学者的关注。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893—1949)》在中国出版后,马上就被日本美铃书房翻译出版。村田忠禧在“译者后记”中指出:该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内容的可信度极高”,“提供了非常珍贵的信息”,^[11]有助于推动毛泽东研究的开展。

3. 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 从深层次上评析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日本学者十分注重开展比较研究 在比较研究中深化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一是进行人物之间的比较。对毛泽东和邓小平历史地位的比较研究是日本学者研究的重点。多数学者能够客观公正地开展研究,但也有扬毛贬邓或扬邓贬毛的现象。其他还有对毛泽东与鲁迅、毛泽东与周恩来等人的比较研究。丸川哲史的《鲁迅与毛泽东:中国革命与现代性》一书,以两人的实践活动为中心,把整个革命史看作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尝试,认为中国有不同于西方的现代性特征。岩间一雄在《鲁迅与毛泽东》一文中指出,毛泽东和鲁迅在通过反对封建主义、开展农民革命等问题上有共同性,但在打破民众的奴隶精神以形成自主自立的主体方法上却有着本质区别,前者主张“大众的方法”,后者主张“文学的方法”。松本一男还将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性格进行了比较,认为周恩来十分注重自我批评,乐于倾听别人的意见;而毛泽东则常按自己的决定行事,不喜欢受人摆布,也不愿意听取别人的意见。而事实是,毛泽东不顾别人的批评,强迫别人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时,常能获得非常好的结果。

二是进行思想之间的比较。柳田谦十郎把毛泽东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比较,认为毛泽东理论有其特殊性,不能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相提并论。他批评了“文革”时期的顶峰论,说“毛泽东理论,作为立足于中国大地的自主独立的理论,将马克思列宁的科学社会主义应用到中国特殊的历史环境,那本身并没有错,然而,如果把它看作比马克思和列宁还要高的当代最高的科学的革命理论,并加以顶峰化和绝对化,而且又让全国人民无批判地盲目相信,进而中国自己再以大国沙文主义的态度让外国党服从这种结论,可以说,其遗害是无法估量的。”^{[8](p113)}

应该说,日本学者多数人能够以客观的态度、详尽的资料开展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提出的观点值得我们深思。但也有些右翼学者受意识形态的影响,缺乏必要的研究资料,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进行了臆断。如何正确认识国外学者的观点,我们必须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有自己的眼光,在客观准确地评析国外毛泽东研究观点的基础上,推动国内毛泽东研究的深入开展。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3-12-27.
- [2] (日)野村浩一. 毛泽东:人类智慧的遗产[M]. 张惠才, 张占斌译.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1993.
- [3] 梁怡, 李向. 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5.
- [4] (日)松本一男. 毛泽东评传[M]. 台北: 台湾新潮社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2006.
- [5] (日)竹内实. 毛泽东传记三种[M]. 韩凤琴, 张会才译.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2.
- [6] (日)竹内实. 中国历史上的四位伟人[A]. 萧延中. 从奠基者到“红太阳”[C].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7.
- [7] (日)新岛淳良.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其继承与发展[A].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 日本学者视野中的毛泽东思想[C].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 [8] (日)柳田谦十郎. 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毛泽东思想[A].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 日本学者视野中的毛泽东思想[C].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 [9] (日)中岛岭雄. 毛泽东早期思想及其特征[A].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 日本学者视野中的毛泽东思想[C].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 [10] (美)施拉姆. 毛泽东研究: 回顾和展望[A].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 日本学者视野中的毛泽东思想[C].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 [11] 韩凤琴. 日本学者评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J]. 中共党史研究, 2000(6).

(责任编辑: 郭荣华)